2013 年 12 月 2 日 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2003731@tom.com 电话：010-62807315

一份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珍贵史料

——《萧锋征战记》

□谢武军

2010 年春天，笔者在《万里长征亲历记》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版）中，发现萧锋所写的《迎接红二方面军》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933 年春天，我在江西瑞金洋溪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任弼时是我们的老校长，这次见首长，感到格外亲切，任政委把我向贺总和关政委作了介绍。 ”这段话为认定任弼时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首任校长提供了一份来自学员的证据。2011 年，一本《萧锋征战记》的问世（《萧锋征战记》是萧锋的遗稿，由南溪、孙翊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1 日出版。本文引文出自此书第 44—58 页。）更是让人喜出望外。书中以 8000 多字的篇幅详细记述了萧锋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生活、学习、所见所闻，在若干方面弥补了中央党校这段历史史料的欠缺。

一、关于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旧址

1、洋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旧址也是列宁团校（即中央团校）旧址。《萧锋征战记》写道：“ 1933 年 2 月底，结束了在列宁团校第一期学习后，少共中央决定选送我和王炳章、邱会玉等三位曾做过共青团工作的学员到党校深造。 ”“ 党校就设在团校老房子，我们由东房搬到北房就算报到了。 ”实际上是团校设在党校老房子，因为这所房子 1931 年底（最迟 1932 年初）就是党校的校址了。

2、洋溪旧址至少四处。现存的旧址是校部、办公室，“ 学生宿舍和教室在村西头两家地主的大院。 ”还有一个“ 教堂（应为祠堂）改成的礼堂 ”。

3、党校第一次转移。1933 年 4 月下旬，蒋介石常派飞机轰炸红都瑞金，洋溪校址已暴露，曾炸伤了两个老表，炸死了老乡家的 4 头猪。党校从洋溪村转移到下萧区。学校的全部家俱只有一些旧桌椅板凳床板，由萧锋同王炳章、阙廷俊 3 名学员负责钉好一只木筏，从洋溪绵江河下水，运到下萧区黄竹堪下新斤村，行程 60 里。

二、党校的列宁室

1933 年 4 月 26 日，《红色中华》第七十三期《纪念“ 五一 ”的准备》一文写道：“ 该校俱乐部在总支委领导下，决定加紧墙报及列宁室工作。 ”列宁室是个什么模样，它有哪些功能呢？《萧锋征战记》详细介绍了洋溪中央团校时期的列宁室：“ 列宁室是用学员们捐献的伙食尾子，再加上团校资助筹建、布置起来的。列宁室的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画像；两侧贴着《国际歌》《工农暴动歌》等青少年爱唱的歌片，还有列宁的名言‘ 青年的任务是学习 ’等标语；室内摆放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 ”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还有苏区中央局主办的《斗争》《红色中华》报，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少共中央主办的《青年实话》等报刊。列宁室是我们业余学习的园地。每天晚饭后，学员们就三三两两的来到这里读书看报，讨论战争形势，学习文化。有时，我们还在这里编快报，拉洋片，编歌曲，排练舞蹈，准备结业演出。这里是我们互教、互学最愉快的场所。 ”党校的列宁室与此大同小异，它兼有图书馆、俱乐部、会议室等多种功能。笔者推测，现存洋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的堂屋，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列宁室。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一期学员人数及第一期高级班学员

按照 1933 年 3 月 12 日《红色中华》第六十期报道，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一期原计划招收 320 人（三月班 80 人，四月班 200 人，高级班 40 人）。萧锋记载，1933 年 3 月 7 日上午，教导处逐个点名编班时，学员实到 125 名，高级班共计 35 个人。战争年代学员不可能一次到齐。除高级班外，其他班学员很可能是陆续报到。《红色中华》曾报道四月班毕业生 150 余人，假设三月班实到 80 人，加上高级班 35 人，第一期学员人数应该在 265 人左右。

高级班学员都是来自苏区红军团以上、地方少共县委书记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班里分三个小组。萧锋记载：“ 青年小组最小的是福建省儿童局书记赖大超，14 岁，最大的也不过 18 岁，青年小组有我、阙庭俊、王炳章、谭启龙、陈丕显等 9 人，妇女小组有李贞、邱会玉、陈碧云、彭儒等 8 人，成年小组有罗桂华、余立金、辛原林、王逸群等l8 人。 ”高级班班主任是杨尚昆同志，班里支部书记是职工总工会的处长、成年组学员戴波淘。学校成立了少共总支（团总支），萧锋任团总支组织委员，兼做班里团的工作。

四、高级班的课程及任课教员

高级班原定学习时间 6 个月，实际学习时间约 11 个月，1933 年 12 月 12 日结业。萧锋记载：“ 3 月 9 日上午举行开学典礼，校长任弼时，副校长董必武（实为教务长，笔者注）到会。董老宣布教学计划和教学方针，即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自修与重点讲解相结合；开设 11 门课程，其中苏维埃运动史由毛主席讲授，中共党史由任弼时（后调湘赣苏区任分局书记）和邓颖超同志讲授，职工运动史由刘少奇和陈云同志讲授，少共史由顾作霖同志讲授，军事课由朱总司令上，自然地理常识由徐特立和陆定一同志上，西方革命史是董必武讲，政治常识是杨尚昆同志讲。赖大超同志代表学员表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用马列武装头脑，锻炼改造自己，更加适应苏维埃运动的形势，以实际行动报答中央领导和党对学员的期望。 ”这些文字比较准确地记载了高级班第一期的课程和教员，可与这些领导的年谱和传记相印证。

更有意思的是书中生动地记述了领袖们讲课的情境，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讲课的主要内容和许多精彩的细节，读来饶有趣味。中央教育部长徐特立是党校教员中岁数最大的。他精力充沛，讲课生动活泼。讲授自然常识他提问：“ 世界上有没有鬼？ ”萧锋抢着答：“ 有鬼！ ”还说自己在水塘边，碰到了一个水鬼，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中央党校副校长兼高级班班主任杨尚昆讲的第一课是“ 猿猴变人，劳动创造世界 ”，末了还说：“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摸下自己的屁股骨还有个尾巴根子。 ”1933 年 5 月 10 日，刘少奇讲职工运动史的第一课，一大早他就骑马来到党校，在校内转了一圈，找高级班的学员聊天，问学员的经历，念过哪些书，对他讲课有哪些要求。他讲课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朱德总司令讲军事课，列举一、二、三次反“ 围剿 ”的战例，把红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讲得活灵活现。他的课，学员记得住，用得上。朱老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修边幅，像个老农。课余时，一有时间，他就找高级班的学员一起打篮球。

1933 年 5 月 23 日下午，学员们在树林里席地而坐，听毛主席讲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毛泽东讲课时，有学员提出“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 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 ”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深入浅出的回答。萧锋写道：“ 毛主席讲的课，言简意明，通俗易懂，解答了我们心中不太明白但又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打开了我们困惑的心结，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明了我们今后战斗的道路。下课时我们热烈鼓掌，欢送主席。后来，毛主席在百忙中还给我们讲了好几课。给我们讲的课，是这 11 门课程中，我们收获最大的。 ”

随着极左路线在瑞金逐渐占据领导地位，党校的领导和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对此《萧锋征战记》也有所记载：“ 4 月底，党校搬到黄竹坑。5 月 1 日，党校在操场召开庆祝会。在主席台上，我们看到了几位首长，其中有一位留西洋分头、带眼镜的首长，听说中央从白区（上海）搬到了红都瑞金，他就是临时中央的书记博古同志（秦邦宪）。另一位叫洛甫（张闻天），还有一位叫罗迈。从此以后，党校的教学内容有了变化，改为以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运动史为主要教学内容，将中共党史和其他课程压缩了许多 ”。博古拿着一本厚厚的俄文书讲联共党史，由于没有教材，他讲的那些苏联的人名、地名，什么孟什维克、民粹派、哥萨克、邓尼金，听来像腾云驾雾一样，搞得大家头晕脑胀。李德上军事课，旁边跟着个翻译，讲了半天，说了两个问题，即袭击、伏击的战法，举的全是拿破仑进攻俄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

五、艰苦的学习生活

萧锋记载，党校学员的宿舍是农民的草房，地上铺上稻草，就是床铺，有时草铺也不够，学员们干脆就睡楼板。在洋溪，学校里只有那个旧祠堂比较宽敞，兼做教室、饭堂、俱乐部、礼堂。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非常破旧，是红都瑞金苏维埃政府支援的。门前的空地上有两副篮球架和两张乒乓球台，是学员们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做的。敌机不断袭扰，学员们经常在茂密的树林里上课。师生都是吃小包饭（用草编成包，饭包上系有写上姓名的竹牌），每人每天定量（学员每人每天 1 斤，工作人员是 7 至 8 两），长期没有食油，大家都吃不饱。学员多是文盲、半文盲，看发下来的材料，还要查字典，搞清语法关系。萧锋感慨：“ 在这种战乱环境中寻求救国真理、学习马列主义，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黄竹堪下后，师生自己动手，种菜养猪，养鸡养鸭，做豆腐，打草鞋。经过努力，膳食大为改善。

六、高级班学员的实习

党校学员的实习课始于瑞金时期，在延安时期得到发扬光大。战争年代学员们是怎样实习的，《萧锋征战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高级班 1933 年 7 月 10 日停课，12 日全队出发到苏区南边的粤赣边区筠门岭县去实习，那里对敌斗争环境比较艰苦。出发时萧锋带上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令》《农村各阶级的分析》和《土地法》等，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走了两天，到达会昌城。7 月 15 日后，萧锋同何金田、赖如昌、赖大超、王炳章等人被分配到招财区实习。他们在招财区半个月做了三项工作：一是放手发动群众，使各个区、乡、村都成立了赤卫队、赤少队，防范靖卫团随时随地的进攻，对地、富分子实行工农专政。二是深入复查分田情况，了解到田岸村、河口屯、新许屯等 3 个村子有 35%的人没有粮食，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他们立即提出建议，请县、区政府给予适当的救济。三是整顿了县独立营。这个营游击习气很重，纪律涣散，组织不纯，实习组来之前，该营中队长、坏分子曾田吉带 3 人 3 支枪反水。实习组协助营长、政委打了 4 仗，边打边整顿，并在战斗中吸收 19 名苦大仇深的国民党俘虏兵当红军，开除了几名动机不纯分子，组织战士学习背唱“ 十六字令 ”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并落实到行动中。经过一段整顿，纯洁了县独立营的队伍，提高了战斗力。

实习结束，先由各实习组在高级班内部汇报，然后到实习所在县委进行总结。8 月 5 日返回学校，由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作了最后的总结。

■链接

萧锋：江西泰和县人，1916 年 2 月 7 日生。1934 年 3 月获红军三等红星奖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陈庄歼灭战，和张钦、曹振国等指战员率先开展了“ 麻雀战 ”“ 地道战 ”和“ 地雷战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解放德州、三打邹平。而后在华东、中原战场上，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皖东、皖西、豫东、沙土集、济南、淮海、渡江、上海和金夏等战役，是陈毅、粟裕得心应手的“ 阻击王牌 ”。在战争实践中，他研究发明的“ 猫耳洞 ”，在阵地防御中起到了重的要作用，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他组织赵明奎、刘天祥、曹振国等研究创造了“ 飞行炸药包 ”，在二、三野的攻坚战和打坦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项成果还被《毛泽东选集》中列为解放战争中的五大发明之一。全国解放后，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第一、三坦克学校校长，1957 年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1981 年离休。萧锋是开国少将，一生打过 1365 次战役、战斗，六次负重伤，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 年 2 月 3 日清晨病逝于北京，享年 75 岁。

纪念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

不能忘记的一句话

□倪德刚

毛泽东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不过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至于怎样朝着指南针的方向走路、用什么方式达到目的地，那要由个人的智慧、水平来决定。指南针决不会具体指出到达目标的路径、阶段、方式等。马克思主义好比指南针，为人类、为无产阶级指明了获得彻底解放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至于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带领自己的队伍实现这一目标，完全要根据国情、根据实践进程而定。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这个常识的基本要求是：第一，理论要与实际紧密相联。第二，理论要服从实践需要。第三，要在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如果在理念上忘记这三点，任何马克思主义原理，即使是普遍真理也不会发挥任何任用；如果在实践中不牢牢贯彻执行这三点，任何实践都会失败。

那么，为什么会屡屡出现“ 偏偏忘记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 ”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是驾驭理论能力不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知半解、略知一二或根本没有学深学透、掌握要义、精神实质或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思想观念上根本不愿意下功夫掌握这门科学，犹如毛泽东所说：有的同志“ 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 ”，这种人怎么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呢？根本不能。另一种是学进去了，掉进书本里爬不出来，只会成篇、成段、成句地背诵书本，成了书虫、应声虫。书本咋说的，他就咋办，离了书本就成了哑巴、聋子、瞎子。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

二是驾驭实践能力不够。对实际情况不熟悉、不了解，只看表面、现象、局部，不深入把握事物的全局、特点、本质、规律、趋势，以一己之偏见就妄下结论、决策，没有不破产、不失败的。经验主义、主观主义与党的悲惨命运如影随形，有了点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弃之如敝履，遇到挫折和失败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过时了。驾驭实践如同掌握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下真功夫不行。毛泽东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下马看花不如分析一朵“ 花 ”。为了真实掌握客观实际，毛泽东提出了“ 四面受敌法 ”和“ 古今中外法 ”。所谓“ 四面受敌法 ”，就是研究中国社会，“ 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观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所谓“ 古今中外法 ”，“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 古今 ’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 中外 ’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 老爷们（指王明为代表的‘ 左 ’倾教条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了。 ”

三是驾驭联系能力不够。有了理论功底，有了对实际的了解，如果是两张皮，互不联系、互不有机结合起来，照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联系 ”二字看似简单、平常，谁都会说，谁都明白啥意思。但真正“ 联系 ”好，“ 联系 ”得像模像样、有成效，实属不易。孔子曰：“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 ”意思是说，能不能射中靶子是水平、技术问题。理论联系实际也是一个水平、技术问题。会不会“ 联系 ”，善不善于“ 联系 ”的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分析哪些理论能应用到实践之中，哪些理论不能应用到实践之中。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理论都应用到实践之中，若此，必然大祸临头。其次，要分析哪些实际问题能够马上解决，哪些实际问题暂不能解决。我们决不能把中国所有问题一下子全都解决，若此，必然大难临头。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在解决如何“ 联系 ”这个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经典范例。无论哪个时期的经典范例，无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四是驾驭创新能力不够。不敢创新或不懂创新，创新创过了头或创新创错了，这类事例很多，案例不少。不敢创新，说白了怕冒风险、怕犯错误。创新不是闹着玩的，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世界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因创新而付出生命的不在少数。凡创新必有风险，必有代价。到底啥叫理论创新呢？理论创新难吗？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 ”“ 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

毛泽东多次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实际而形成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部）

“ 扯袖子 ”是一种教育爱护

□赵 畅

11 月 13 日，中央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纪检工作实际，就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部署。会议强调，强化对党风政风的执纪监督，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纪政纪、涉嫌违法行为审查和处置力度，坚决惩治腐败。要督促各级党委和纪委抓早抓小，发现领导干部苗头性问题及时了解核实、诫勉谈话，扯扯袖子，甚至大喝一声。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已经查处的一些案子看，贪官的“ 成长 ”往往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亦就是说，贪官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为贪官。既如此，那么，贪官在渐变过程中，其身上就不可能不暴露出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哪怕是一些蛛丝马迹。此时，在了解核实的基础上，给他扯个袖、提个醒，“ 甚至大喝一声 ”，无疑能让其幡然醒悟，以至令其及时改正错误，以免重蹈覆辙。

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以至从小贪沦为大贪、巨贪，其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发生扭曲，导致人生的价值取向发生偏差，放纵自己的贪欲，最终走上堕落的道路，这固然是其主因，但有时组织上及其领导干部对其发生“ 微 ”“ 渐 ”问题之时缺乏必要的扯袖、提醒，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的，因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一些人便胆大包天、为所欲为起来，而待其真正触犯了党纪国法，再要去教育挽救，则终究为时已晚。

或许，在一些组织和领导看来，个别干部廉洁方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实属难免，如果及时向他们提出来，多少显得有点小题大做；做些教育批评，便意味着得罪人。于是，在“ 种刺 ”莫如种花里，大家便只好罢手。殊不知，因为“ 老好人 ”思想作祟，因为不想得罪人，于是，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滑向腐败的深渊。就此而论，这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不负责任吗？放任自流，我们是否也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 推手 ”呢？

真正的关心爱护同志，并非取决于在他们顺利的时候、取得了成绩的时候往这些同志脸上贴多少金，给予多少的赞美，而是要在这些同志遇到挫折的时候、碰逢困难的时候，尤其是犯了错误的时候，给予了他们多少真诚的教育帮助——哪怕是一次扯袖、一个提醒，“ 甚至大喝一声 ”，对于他们都是一种“ 雪中送炭 ”的行为。或许，他们一时接受不了，以至颇为反感而闹对立情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定然能够渐渐体会到组织和领导的良苦用心和真挚的关爱，深以为受益匪浅，从而发乎内心地感谢，并永远铭记曾经的教训，从此做到“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 慎微慎独慎始慎终 ”。从这个意义上说，扯个袖、提个醒，“ 甚至大喝一声 ”，可谓善莫大焉。

反腐败工作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在于查处了多少贪官，而在于通过严密的制度、严格的监督、严肃的教育，制止和避免了多少干部失足，挽救和保护了多少干部，并引导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干净干事。“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 各级党委和纪委抓早抓小，发现领导干部苗头性问题及时了解核实、诫勉谈话，扯扯袖子，甚至大喝一声 ”，这固然重要，作为身边的同事更要借见事早的优势，勇于并善于从教育改正、挽救帮助的目的出发，及时扯袖提醒。要知道，这不仅是在提醒别人也是在提醒自己，不仅是在“ 正人 ”更是在“ 正己 ”。

随 笔

别党校

□薛宝生

忽忽两月倒数天，晨练再走西湖边；
红枫如火抒烂漫，银杏叶黄写流连；
寒鸭剪开水如缎，山色如黛柳含烟；
掠燕亭上忆岁月，亮眼桥头访古贤；
心如静水一池碧，身追彩凤入云间；
谁云人生无再少，返老还童兴更酣；
失之东隅虽为憾，收在桑榆机会难；
高师悬河酬灌顶，自信人生二百年；
同窗赤诚肝胆晒，学风人心映斑斓；
佳句拾得常有忘，好友交成一世缘；
朝夕相处情非浅，相见时难别亦难；
昨日有梦已为真，今日成想在何年；
学海无涯苦日短，躬行路遥意志坚；
此去八方心可仪，大有庄里再耕田。

（作者系中央党校进修部厅局级干部进修班（第 61 期）“ 党的建设科学化 ”研究专题二支部学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杂志社总编辑）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 88 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